

 羊城学术文库·文史哲系列

自主创新的话语建构

从意识形态到创新文化自觉

The Discourse Construction of
Independent Innovation

李三虎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013026279

F204
28



羊城学术文库·文史哲系列



自主创新的话语建构

从意识形态到创新文化自觉

The Discourse Construction of
Independent Innovation

李三虎 著



北航

C1633494

F204/28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自主创新的话语建构：从意识形态到创新文化自觉/
李三虎著.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3

(羊城学术文库)

ISBN 978-7-5097-4318-8

I. ①自… II. ①李… III. ①国家创新系统-研究-
中国 IV. ①F204 ②G322.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35635 号

· 羊城学术文库 ·

自主创新的话语建构

——从意识形态到创新文化自觉

著 者 / 李三虎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责任部门 / 社会政法分社 (010) 59367156 责任编辑 / 孙燕生 韩莹莹 荣志远

电子信箱 / shekebu@ssap.cn

责任校对 / 师晶晶

项目统筹 / 王 绯

责任印制 / 岳 阳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 装 /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20

印 张 / 15.4

版 次 / 2013 年 3 月第 1 版

字 数 / 267 千字

印 次 / 201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097-4318-8

定 价 / 58.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羊城学术文库学术委员会

主 任 顾润清

委 员 马卫平 王永平 王志雄 朱名宏
李兰芬 杨长明 杨清蒲 郑伯范
郭 凡 徐上国 徐俊忠 马 曙
谢博能 雷忠良 谭曼青

编辑部主任 陈伟民 金迎九

“羊城学术文库”

总 序

学术文化作为文化的一个门类，它是其他文化的核心、灵魂和根基。纵观国际上的知名城市，大多离不开发达的学术文化的支撑——高等院校众多；科研机构林立；学术成果丰厚；学术人才济济，有的还产生了特有的学术派别，对所在城市乃至世界的发展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学术文化的主要价值在于其社会价值、人文价值和精神价值，学术文化对于推动社会进步，提高人的素质，提升社会文明水平具有重要的意义和影响。但是，学术文化难以产生直接的经济效益，因此发展学术文化主要靠政府的资助和社会的支持。

广州作为岭南文化的中心地，以其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其文化博采众家之长，汲中原之精粹，纳四海之新风，内涵丰富，特色鲜明，独树一帜，在中华文化之林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改革开放以来，广州成为我国改革开放的试验区和前沿地，岭南文化也以一种崭新的姿态出现在世人面前，新思想、新观念、新理论层出不穷。我国改革开放的许多理论和经验就出自岭南，特别是广州。

在广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培育世界文化名城的新的历史进程中，在“文化论输赢”的城市未来发展竞争中，需要学术文化发挥应有的重要作用。为推动广州的文化特别是学术文化的繁荣发展，广州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组织出版了《羊城学术文库》。



自主创新的话语建构

《羊城学术文库》是资助广州地区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理论性学术著作出版的一个系列出版项目，每年都将通过作者申报和专家评审程序出版若干部优秀学术著作。《羊城学术文库》的著作涵盖整个人文社会科学，将按内容分为经济与管理类，文史哲类，政治、法律、社会、教育及其他等三个系列，要求进入文库的学术著作具有较高的学术品位，以期通过我们持之以恒的组织出版，将《羊城学术文库》打造成既在学界有一定影响力的学术品牌，推动广州地区学术文化的繁荣发展，也能为广州增强文化软实力、培育世界文化名城发挥社会科学界的积极作用。

广州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前 言

近十多年来，创新问题在我国已从科技界、商业界进入政治视野，逐步上升为国家战略。这种战略定位无疑涉及国内外各种经济、政治和文化因素，但归结起来无外乎如下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高速经济增长为自主创新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同时依靠过度投资、大量资源消耗和密集型劳动推动的原有发展路径正面临着资源环境和分配溢出效应的约束，其增长质量的重估要求创新必须成为国家优势；二是在国际竞争意义上，中国发展转型所需的关键技术、核心技术并不能通过市场交易或技术引进获得，而只能通过独立的技术创新创造出来。围绕创新问题，目前中国政策领域和知识界借助不同词语，强调它的经济、社会、政治和国家意义。这些词语大致分为四类：一是基本词语，如技术创新、自主创新、关键技术、核心技术等；二是目标词语，如创新型国家、创新型城市、创新型企业、创新型人才等；三是手段词语，如制度创新、组织创新、管理创新等；四是相关词语，如学习型政党、学习型社会、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发展方式转变、转型升级等。如果类推下去，还可以列出许多强调创新意义的相关词语。从当前我国科技政策修辞看，最基本的词语还是创新、自主创新。不言而喻，中国在发展战略和国家目标上倾向于使用自主创



新一词。自主创新一词，当然也构成了本书的主题词语。

国内外学者目前已经注意到中国对研究开发投入的巨大增长以及对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持续努力，但我国将建设创新型国家作为一项中长期目标，还是受到西方分析家两方面的质疑：一是中国自主创新政策，是否是某种技术民族主义；二是认为中国缺乏自主创新的文化基因，担心中国是否能够真正建立起以企业为主体的国家创新体系。如果不能做到研发经费的有效使用、创造创新制度环境和培育合格创新型人才，那么创新型国家目标就很难实现。前一质疑导向了意识形态，后一质疑涉及的问题较为复杂，包括国家治理、政府体制、组织管理机制、教育培训、创新型人才培养、创新文化培育等各个方面的问题，不过它们的共同指向则是创新文化自觉问题。

对于创新文化的本质，现在人们是“基于对文化的内隐结构和外显模式的二元理解，即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其外部表现是行为模式”（纪光欣、怀宝燕，2010：9）加以认识的。创新文化的内隐结构，是指它作为一种理念和价值观在社会文化体系中以崇尚创新、追求创新为价值取向，对人们的创新态度和创新活动具有引领功能，对人们的创新潜能和创新思维具有激发功能；创新文化的外显模式，是指它作为一种行为模式由与创新实践有关的道德规范、行为准则、行为模式、生活方式、传统习俗等因素构成，属于创新价值观的行为或实践体现。进一步说，创新文化是“一种有效激发创新意识和热情、鼓励和支持创新行为、增强创新动力和能力、营造创新活动空间的文化精神、文化模式和文化环境”（纪光欣、怀宝燕，2010：9）。这主要是从文化学给予的解释，当然人们还可以从心理学、社会学乃至哲学做出更多说明，将创新文化看作一种个体文化、群体文化、社会文化或民族文化以及人类存在或生存显现。但今天我们毕竟不再在一般意义上讨论创新文化问题，因为回到自主创新上来，现在强调创新的自主性本身就属于文化范畴而不独是经济范畴。在这种意义上，正如有学者指出：

迄今的创新文化建设并没有直面“为什么要自主”这样的问题。对中国来说，上述问题既是哲学问题，也是带有历史沧桑感的文化问题，并与中国人的集体记忆和感情密切相关。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把握中国文化关于“自主”的微妙宏旨，争取对其文化起点、历史演变及其未来的可能发展等取得共识。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把握自主创新的意蕴，并以此为基础开展创新文化建设，使人们有所触动而焕发精神。那么，到底是什么触动了决策者，使自主创新战略上升为国家发展的核心原则？其实，这个问题的答案可以人情推之。一般情况下，一些不顺心的事情并不值得深究。但当不自主一旦危及自我发展的时候，追求自主发展就是触发革命性变化的原始动力。一个人是如此，一个国家也是如此。回顾我国的近现代发展历史，不自主的事例比比皆是。即便是在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后，当“核心技术是市场换不来或引进不来”成为新共识的时候，加强自主创新就成为我国的自然选择。但由于立场不同，角度不同，利益主体不同，不同非国家性主体对自主创新的态度明显分化。创新文化建设应当直面并解决这个问题，而如何增强自主性则是各个主体都要面对的共性问题。（张超中、武夷山，2011：30）

上述引证表明，“自主创新”本身应是一种依照自主性原则建构的创新话语体系，它作为一种文化因素，其基本要求是围绕自主性原则，启动各种文化资源（包括意识形态、民族传统和公众文化等），达成全社会创新文化自觉的普遍共识。鉴于这一思路，为了回应前述西方分析家提出的两点质疑或两个问题，本书超越科技投资、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以及创新管理体制机制这类范畴，试图将自主创新提供一种“话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视角，力图将自主创新看作一种遵循自主性原则或创新自觉原则的话语建构。

话语分析是指以“话语”（即文本、语言或其他符号或事件）



为研究对象，揭示“话语”隐含的动机（或称语义），然后对这种动机要么给予高度强化，要么给予批判。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对“话语”一词存在多种理解，但其基本理念至少都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话语会吸引人们对语言交流，特别是对某些焦点词语使用的集中关注；二是话语的形成和发展，在习俗、文化、制度、技术的社会建构中会扮演重要角色；三是话语通过其形成、组织和表达能力，不仅能对事物或事件起到描述作用，而且能对人们的行为起到引导作用。也就是说，一种话语的普遍流行源于它包含的旨趣集聚，从而也就成为一种理所当然的实践和修辞。在这种意义上，福柯（M. Foucault）作为话语分析的重要理论家，提出一种话语构造理论。为了解现代权力意义，他特别强调话语在统治体系构造中所扮演的核心角色。在他看来，知识生产与权力操作两者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因为存在一种“真理政体”（regime of truth）：“‘真理’与权力系统之间的联系在于一种循环关系，就是一方面权力生产出并支撑着‘真理’，同时‘真理’也会导致权力效应，即诱导并扩大权力。”（M. Foucault, 1980: 133）福柯曾运用所谓谱系学的历史分析方法考察知识生产内部的不连贯和斗争，强调“真理”之所以成为“话语政体”的产物，是因为它在一定历史时期占据统治地位。这样，所谓话语构造便成为这样一种实践集合，即通过话语实践“对言说客体及其关系的系统构造”（Dreyfus and Rabinow, 1982: 62 - 63）。也就是说，话语构造是一种在一定历史情境中构造和表达思想的实践系统，它通过知识的“客体”和“主体”构造将“真理政体”建立起来。这里，知识的“客体”是一门学科或一个社会领域（如“监狱”）建构的实体（如管理国家权力的法律规范、纪律、社会范畴等系统），并通过其追随者成为研究和阐述目标；知识的“主体”则是在对某一社会领域进行描述时，对社会个体进行特殊的话语定位（如“失职者”“罪犯”等），并通过道德或良心将他们固化为自我的建构物。话语构造的强大力量在于，它对占据统治地位的世界观或意识形态的建构能

力。这种占据统治地位的世界观或意识形态一旦形成，就能成为指引人们行为和实践的巨大力量。目前“创新”这一概念以对经济持续增长的一个解释变量出现，被解释成为对国家繁荣、经济增长、社会进步、企业生存和国际竞争起着重要建构作用的政治因素，通过我国政界、科技界和企业界被看作导向又好又快的科学发展的关键路径。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将自主创新看作形成我国经济内生增长实践认同的一种大规模话语构造。

我国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各种领域，普遍使用的“创新”一词有各种用法或语义。总体上看，大致可以分为描述性创新话语与规范性创新话语两类。自熊彼特（J. Schumpeter）开始到目前为止，创新已经成为经济学范畴的流行话语，形成了描述性创新话语传统。20世纪30年代，为了解释经济长周期的不均衡效应，熊彼特引入“创新”（innovation）一词并将它与经济发展联系在一起，认为发明、创新和企业投资这些因素共同作用形成了经济发展的引擎或动力。在这里，创新源于技术和组织的不连续性飞跃，经济繁荣启动来自若干创新先锋的特殊贡献。自那时以来，创新便成为一个与科学、技术和发明相关的经济学主题。“创新”一词的最正统语义，便是指企业产品及其生产工艺的变革或改进。不同经济学家、经济学著作和经济学教科书，一般均会采用这种描述性话语。从技术来看，创新就是新技术发明以及基于新技术的产品、工艺或服务的市场开发与引入；从产品设计来看，创新就是新产品、新工艺和新流程的引入；从产业部门来看，创新表现为新产品、新工艺引入的过程，包括可行性论证、申请、开发与设计以及推广等；从创新者培养来看，创新被看作经济财产、民族文化、创造力的提升和创新激励，包括创造力培训、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等。按照描述性创新话语，创新可以按照活动或过程、组织、个人才能和国家基础设施等术语来加以建构，以便支持新产品、新工艺的开发和引入。目前我国出现的诸如创新、科技创新、技术创新、工艺创新、企业创新、创新型国家、创新型城市、国家创新体系等，大



致上均属于描述性创新话语。可以看出，描述性创新话语是以新产品、新工艺的引入倡导这一公认的创新含义来加以构造的。

然而，创新并非经济发展的唯一选择。奈尔森（Nelson）和温特（Winter）曾指出，经济发展除选择创新外，还可以选择“模仿”（Nelson & Winter, 1982）。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正是在长期技术模仿遭到挑战之后，才逐步转向以“自主”为修辞语的“创新”来构造其描述性创新话语。在这里相对于技术模仿，自主创新是指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独特的核心技术创造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新产品引入，包括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原始创新是指前所未有的重大科学发现、技术发明、原理性主导技术创新，它意味着在研究开发方面，特别是在基础研究和高技术研究领域取得独有的发现或发明；集成创新是指对各种现有技术的有效集成，形成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或者新兴产业；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是指在引进国内外先进技术的基础上，学习、分析、借鉴，进行再创新，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技术和新工艺。无论如何，这些概念连同创新型国家、自主知识产权、国家创新体系等其他话语，都未能离开新技术、新产品、新品牌引入这些正统的创新概念。在这种意义上，单就中国特色自主创新来说，自主创新与创新其实可以相互交替使用。

当然，如果超越以上描述性创新话语，抛开产品和工艺本身，那么就可以发现“创新”一词是指“新奇”的创造。这一用法接近于前熊彼特时代的“创新”语义。英语“innovation”一词最早来自拉丁语“innovationem”，其动词形式为“innovare”。该词结构为“in + novare”，意为引入新奇事物。这样“创新”一词的抽象含义，就是用来描述新奇事物引入及其带来的各种变化。莎士比亚在《亨利四世》中有一句台词说，“喧嚣率直的创新带来新奇，面对这种新奇那点可怜的不满，只是张口一笑、擦肩而过”。对于西方人创新意识的普遍觉醒，莎士比亚的这种口吻略带有一丝预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无疑也能找到与“创新”相一致的词源。儒家经典中的“（日）日新”“知新”“（亲）新民”等，均是指持续

更新或追求新颖等。正是通过创新的这种抽象意义，可以赋予它以一种哲学或战略地位，从而形成规范性创新话语。在西方发达国家，这种规范性话语主要表现为两方面内容：一是从企业来看，创新是企业持续生存的唯一出路，企业必须成为“创新机器”，企业家精神就是创新精神，企业“不创新，毋宁死”；二是从国家来看，创新绩效是国家财产，创新对国家、企业和个人具有同等意义，政府必须为技术创新创造条件，强化生产科技知识并通过企业成功推广科技知识的国家能力，绝不能“坐等创新”。与此相似，中国围绕自主创新更是广泛地构造了自身的规范性创新话语：一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必须大力发展科学技术，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真正摆在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位置；二是强调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和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中国必须发扬民族的创新精神，把科学技术事业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占据科技创新主动权；三是核心、关键技术是市场换不来的，必须发挥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显著提高产业技术水平、增强科技竞争力；四是强调企业是创新主体，企业的生命在于创新，创新是企业生命之源。当然中国目前的规范性创新话语更为宽泛，尤其是体制创新、制度创新、社会管理创新、文化创新等话语，更是完全超越了描述性创新话语的新产品、新工艺的引入这一基本内涵。

应该说，描述性创新话语与规范性创新话语均以技术创新为显著特征，且都认为创新是一种善举。但这两种话语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们各自试图解释不同现象。如果说描述性创新话语关心的是新产品开发的具体问题（如研究开发管理、技术指南等），那么规范性创新话语则在制度或国家层面上更为关注技术变化态度涉及的抽象问题（如个体和企业是否愿意创新等）。进入福柯式的话语构造上来，与描述性创新话语相比，规范性创新话语更加倾向于将一种创新管理要求转换成为意识形态和创新文化自觉。毫无疑问，规范性创新话语有利于在更大范围内推动描述性创新话语进入经济实



践。因为规范性创新话语在管理意义上将创新看作一种经济命令、社会命令甚至政治命令、国家命令，看作每种组织和国家经济成功的决定性标准和战略目标。在这里，创新不再是一种可做可不做的事情，也不再是一种辅助目标，而已经被预设为企业生存、经济竞争和国家繁荣的关键和核心。沿着这一管理倾向，西方人开始构造一种新的意识形态话语，诸如“技术资本主义”“软资本主义”等等。关于技术资本主义，本书后面还要谈到，这里主要讨论“软资本主义”。美国政治学者特里夫特（Thrift）认为，资本主义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已经历了诸多变革，构造了一种“适应性特征及其可能的福利性、共享性社会气质”，日益形成了所谓“软资本主义”（Thrift, 2005: 11）。这里的“适应性特征”，是指围绕技术或成本优势获得形成的“文化、知识和创造”“认同”“价值、信仰和设想”以及“生活的心理王国”等。所有这些都使资本主义在经济组织上，针对全球市场具备了灵活性、敏捷性、适应性、应对性和创造性。这种新型的“软资本主义”的建构或形成，源于一种“资本文化循环”（cultural circuit of capital）机制。正是通过“资本文化循环”这一话语构造工具，资本主义为与创造和创新相关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大量知识和信仰。特里夫特指出，“那些管理理论大多直接或间接涉及创造和创新，为此可以把这种因资本文化循环激发的知识革命看作创新的习俗化”（Thrift, 2005: 6 - 7）。这种文化循环至少涉及四类关键利益相关群体，即商业学校、管理咨询公司、管理专家和公共媒体。前三者是创新话语的主要构造者，致力于创新话语的分配和循环，它们的合作和联系形成了一种创新话语权力构型。

上述“软资本主义”话语构造的意识形态意义，倒不在于它强调“不创新，毋宁死”的经济命令，而在于它突出了“资本文化循环”的资本主义全球化逻辑。在目前非常流行的《世界是平的——21世纪简史》一书里，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认为技术进步创造了一个“平坦世界”，削平了所有民

族、国家、企业和人民的“竞争产地”，使全世界的每个人都能参与全球事业和共享全球繁荣。在他看来，世界已进入一个人人都能普遍接近技术并受每个人驱动的新的全球化阶段，它被新技术赋予了一种“独特动力”，就是“个人在全球范围内的合作与竞争”（弗里德曼，2006：8）。在这个世界中，每个人都能自由地参与创造和创新的市场发展。这种话语构造显然不属于描述性话语，而是以规范性创新话语构造一种世界观或意识形态。正如美国政治学家福山鼓噪的“历史终结论”一样，弗里德曼的明显意识形态指向是在技术全球化与资本文化循环之间画上等号，从而将技术全球化等同于资本主义全球化。弗里德曼虽然并不完全赞同世界平坦化“必然导致各种文化的同化”或“全球化只是资本主义”，但他同时认为“全球化的铁律很简单：如果你把它想成全都是好的或全都是坏的，那你将不会得到它”（弗里德曼，2006：370）。他的意思是说，如果你不把世界平坦化看作全都是坏的，那你就得承认“软资本主义”的“资本文化循环”逻辑，即使这种“软资本主义”不能同化不同民族文化，任何本土文化要想有自身的发展空间也需要服从“资本文化循环”规律。我们需要吸收技术全球化过程中反映的描述性创新话语指向，但这并不意味着要在规范性创新话语意义上接受资本主义的“资本文化循环”。因为如果我们不把世界平坦化看作全都是好的，那我们就得构造自身独特的规范性创新话语。事实上，中国以开放的姿态，在吸收世界技术文明成果的同时，倡导“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正是这样一种话语构造指向。

沿着上述思路，本书认为规范性创新话语分析是一种意识形态分析。因为规范性创新话语构造，其目标在于使自身成为一种主导意识形态，从而发挥其文化引领作用。在此意义上，本书将自主创新看作一种大规模话语构造，它的构造目标是形成一种新的发展意识形态、新的企业组织实践和新的社会文化认同。这种话语构造预设了“创新命令”，即面对全球化挑战以“忧患意识”推动的国家、企业和社会的“生存 - 竞争 - 发展”的意识形态激励逻辑。



“创新命令”构成了挑战与机遇并存的战略性宏大叙事，代表着中国新发展阶段的未来希望和全球竞争的风险防范。这种自主创新话语的意识形态意义在于，对创新型国家建设进行一种文化引领，赋予国家以新的发展活力，在全社会形成巨大的创新洪流。进一步说，本书的出发点是以自主创新话语构造激励和加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新时代来临，而这个新时代的重要特征是以自主创新持续地追求新技术、新产品和高品质的发展转型。为此本书将以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为指南，结合中国文化传统，追溯自主创新话语的历史生成过程，对走自主创新道路的中国特色做出建构论解释，同时针对自主创新话语构造面临的意识形态挑战强调全社会的创新文化认同。

本书第一章开宗明义，明确将自主创新作为一个意识形态主题加以讨论，意在为后面章节进一步讨论做一铺陈。中国将自主创新作为国家战略核心，这本身表明自主创新已成为一种经济、政治乃至国家命令。对这一创新命令，国外政治经济学多以“国家创新率之谜”加以修辞，并以“制度决定国家创新率”加以解答。在政治或国家制度上，这种修辞总会涉及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问题。为了避免这种意识形态纠结，我国科技界、经济学界针对自主创新命令修辞，一般是接受国家创新系统、国家创新能力这类概念，将“创新”一词从比较政治经济学围绕创新问题形成的诸多政治或制度修辞（如自由市场、非集权化或民主等）中剥离出来，并用于技术变迁与制度改革，极力强调国家在创新中的激励和培育作用。这种把国家作为“创新工具”的政治经济学思路，固然能够从制度层面突出国家创新率提高的战略主题，但它并不能有效地引导人们去深刻理解自主创新道路的中国特色，自然也无法在理论上应对国外学者围绕我国自主创新问题提出的意识形态挑战。为了应对各种意识形态挑战，必须在“全球性－民族－国家”格局中，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视角考察中国自主创新话语，以便突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技术强国地位或形象。

第二章主要立足于技术负荷意识形态价值这一技术政治哲学前提，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技术创新理论进行考察。这里要表明的是，西方学者在构造“技术资本主义”的规范性创新话语时，仍然部分地吸收了经典马克思主义思想。技术并非中立工具，技术目的也不单纯是一种局部力量，技术与目的可以同时得到重塑。在这种意义上讲，经典马克思主义对技术的异化哲学批判，当然有利于从技术目的方面塑造当代资本主义的规范性创新话语。当然经典马克思主义并不限于资本主义的技术批判，它也对社会主义技术价值给予了预设。这就是着眼于人的全面发展，强调技术创新的使用价值创造及其背景化操作。这种技术价值预设既不排除吸收资本主义的技术成果，又表明社会主义的独特创新道路。经典马克思主义这些创新话语构造，为中国自主创新话语构造奠定了理论基础。

第三章进入中国历史情境中，考察中国技术强国理念形成及其多种语义发展以及最终汇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语境的话语构造过程。中国从传统到现代的历史变化进程，至少涉及三个大事件：1911年的辛亥革命爆发、1921年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和1949年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辛亥革命前，从鸦片战争到戊戌变法，中国现代主义式的技术强国理念得以确立起来，其国家现实的操作逻辑在于：以竞争态势进入由技术、商业和军事霸权主导的世界体系，复制资本主义技术、资本和军事扩张的现代化途径，以便最终使中国在从中华帝国向现代民族-国家转换的过程中确立自身的主权地位。但这种创新话语毕竟不能完全脱离意识形态加以建构，经过多重话语交锋之后，最终从维护传统走向了接受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并通过辛亥革命进入制度化实践。辛亥革命后，特别是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技术强国的创新话语经历了社会达尔文主义、唯科学主义和技术精英治国论等话语构造阶段。但所有这些话语构造与晚清思想一样，均拥有如下思想假设：西方国家的技术优势意味着西方文明本身拥有强大的文化实力。也就是说，当一个民族或国家普遍地认为自身技术能力低于别国时，那就是对自身